

家學與師承

——著名學者談治學門徑

【第一卷】

張世林
編

二十世紀中國學人自述
百年人文學術心靈歷程



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

家學與師承

——著名學者談治學門徑

【第二卷】

張世林 編

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
· 桂林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家学与师承:著名学者谈治学门径(第二卷)/张世林编.
—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1
ISBN 7-5633-6293-2

I.家… II.张… III.治学方法-文集
IV.G795-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055407 号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桂林市中华路 22 号 邮政编码:541001)
网址:www.bbtpress.com

出版人:肖启明

责任编辑:吴晓斌 杨晓燕

封面设计:蔡立国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发行热线:010-64284815

山东新华印刷厂临沂厂印刷

(临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工业北路东段 邮政编码:276017)

开本:960mm×1380mm 1/32

印张:13.75 字数:330 千字

2007 年 1 月第 1 版 2007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0 001~6 000 定价:40.00 元(全套 120.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电话:0539 2925659)

前言

我这十年来所从事的主要编辑工作，就是抢救文化财产。其主要成果是：1998年由中华书局出版的《学林春秋——著名学者自序集》；1999年由朝华出版社出版的六卷本《学林春秋》和2000年出版的《学林往事》；2001年起由新世界出版社陆续推出的“名家心语丛书”：季羨林著《千禧文存》《新纪元文存》，何兹全、郭良玉著《三论一谈》，侯仁之著《晚晴集》，周一良著《郊叟曝言》，金开诚著《文化古今谈》，钟敬文著《焚尾集》，张岱年著《晚思集》，任继愈著《竹影集》，冯钟芸著《芸叶集》，吴小如著《霞绮随笔》，吴宗济著《补听集》，王钟翰著《清心集》，来新夏著《出枋集》，吴冠中著《短笛无腔》，华君武著《漫画一生》，张允和、张兆和著《浪花集》，周有光著《见闻随笔》，彦涵、白炎著《求索集》，赵俪生著《桑榆集》等。

我之所以开列上面这一大串书名单，不是为了表现自己的“抢救”成果，而是想说明两个问题：一是我的抢救工作不是一时的心血来潮，而是十年一贯制，且还将继续下去；二是我的抢救工作已从传统的文、史、哲等领域扩展至艺术等文化领域。当然了，熟悉学术界情况的人都知道，上述书中的部分作者已经永远地离开了我们，但他们的学术思想和治学心得却可以长久地流传下去，嘉惠后学。这是促使我从事文化抢救工作的主要原因。

目前，出版界的情况确实比较混乱，相当一部分出版社唯利是图，根本不关心文化建设和文明的承传，制造了一大批低俗、媚俗、庸俗的文化垃圾，其结果只能是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坑害了读者而最终害了自己。在他们的眼中，抢救文化财产能卖几个钱？可确有与之截然相反的一些出版社，他们一

贯坚持出版高质量、高品位的学术图书，并以崇高的出版理念和良好的出版业绩而赢得了社会的广泛关注和信任。我与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的合作是十分愉快的，因为他们也同样关注文化抢救工作。2005年他们就将我编的《学林春秋》初编改名为《为学术的一生》重新面世，颇获读者欢迎，已经售罄。为了方便读者购买和阅读，出版社将《学林春秋》初编及二编合在一起，改名为《家学与师承——著名学者谈治学门径》，分三卷重新出版。我自是欣然同意，并借此良机，一方面增补进去七篇新的内容：郭预衡先生的《我和中国古代文学史》、漆侠先生的遗作《我和宋史研究》、汤炳正先生的《我与楚辞》、王桧林先生的《我与中国现代史》、齐世荣先生的《我和世界现代史与世界通史》、汤一介先生的《我和中国哲学》、刘家和先生的《我与中外古史比较研究》。这七篇文章是我后来新组的，交稿时《学林春秋》二编早已出版了。这次总算可以把它们补入了，了却了我一桩心事。另一方面，这次出版，还改正了过去出版时遗留的一些错误。原书中有多处提到《学林春秋》，因为已是历史，便不改动。

总之，这部书就要以新的面貌同广大读者见面了，遗憾的是，书中的作者有多位已谢世，不能看到新书了。然而，他们的音容笑貌总是出现在我的眼前。他们给我的帮助和教诲令我永志于心。他们的英名和业绩当永远记载在20世纪中国学术史上，并将长久流传下去，泽被后世，嘉惠学人。我坚信，随着时光的推移，这部书的学术价值将会为越来越多的读者，特别是莘莘学子所看重。因为，这批学者们的宝贵治学经验都是不可多得的。当然了，抢救文化财产的工作对我来说还任重而道远。

张世林

2006年7月9日

目 录(第二卷)

前 言	1
-----------	---

我和《清史稿》与《清史列传》	3
----------------------	---

王钟翰 | 记得1971年9月1日我被借调中华书局参加整理标点“二十四史”以外增加的《清史稿》一书的工作。同一天到书局报到的尚有启功同志,我们二人因事迟来了两个月。早两个月先到我们《清史稿》组的有罗尔纲、刘大年、孙毓棠三位同志。

我和校雠学	13
-------------	----

程千帆 | 我历来主张研究文学,要将考证与批评密切地结合起来,将文献学与文艺学密切地结合起来。文学批评应当建立在考据的基础上,文艺学研究应当建立在文献学知识的基础上。从事文学,特别是古代文学研究的人,不一定人人成为文献学家,但应当人人懂得并会利用校雠学知识。

我与《髹饰录解说》	23
-----------------	----

王世襄 | 当代考古发掘报告、文物鉴赏文章有关漆器的材料甚多……在那些年月里,我是多么想能外出采访,核实材料啊,可那是不可能的。拉上窗帘,围好灯罩,像做“贼”似的,闭门写作,还生怕被发现扣上“白专道路”帽子,开批判会。夫复何言!夫复何言!

我与唐史研究	33
--------------	----

王永兴 | 我研究唐史,首先要感谢恩师陈寅恪先生。六十年中,我从先生受教,先生传道授业解惑使我读书为己,开始走上宋贤所开辟先生继承发展的为人治史之路。

我和汉藏语研究	57
---------------	----

邢公畹 | “汉藏语”是指汉语、藏语以及和它们可能有亲缘关系的许多语言的群体。“汉藏语研究”是语言科学的一种实际作业——对一系列有关的汉藏语言进行调查研究,看看能不能形成一个语系。

我和《广韵》

71

周祖谟 | 我在进行校勘的时候,先以张氏泽存堂初印本作为底本,与其他宋本和元明两代的刻本对校,凡有不同,都记在泽存堂本的书眉上。这是一道工夫。然后另取一本泽存堂本与上述的二十种唐五代韵书对校,同样把不同处记在书眉上。这又是一道工夫。有了这两个校本作基础,然后进行一字一行的校定……改正原书错字一千七百一十二字,增补脱文一百九十五字,删去衍文七十字,共校正讹误一千九百七十七处。

我和《马可·波罗游记》

79

杨志玖 | 1995年,英国学者伍德博士撰写出版的专著《马可·波罗到过中国吗?》,全盘否定了马可·波罗到过中国的事实,引起了有关学者的关注和国内外传媒的轰动。书中对笔者多年前写的证明马可·波罗到过中国的资料和阐述也予以否定。为此我写出《马可·波罗到过中国》一稿作为回答。

我与《中华大藏经》

95

任继愈 | 1982年,国务院恢复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在成立大会上,我提出有必要编辑一套“佛教全书”《中华大藏经》。得到小组的批准并成立了“中华大藏经编辑局”,由我负责主持这一工作。我们即以《赵城金藏》为底本,与其他八种版本的大藏经对勘,终于编辑出版了《中华大藏经》(汉文部分)上编全部一百零六册。

我和中国神话

113

袁珂 | 我研究神话,是从1947年在台湾编审委员会做编审时候开始的,写了简本《中国古代神话》和神话论文《山海经里的诸神》。那是受了茅盾先生《中国神话研究ABC》的启发,觉得应该把散珠碎玉般的神话资料缀集起来,使它们成为一件比较完整的东西,普及到读者中去,以发扬曾经璀璨一时的我国古代神话的精神。

我和顾炎武研究

129

赵俪生 | 鄙人致力于顾炎武的研究垂六十年,下这番劳动,还是值得的。因为这个人不是一般的人,他是一个爱国主义者,但不是一个一般的爱国主义者,不是那种叫叫口号贴标语的爱国主义者,也不是一个抛头颅洒热血类型的爱国主义者,他是浑身浸染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爱国主义者。

我和敦煌学

139

饶宗颐 | 我一向认为敦煌石窟所出的经卷文物,不过是历史上的补充资料,我的研究无暇对某一件资料作详细的描写比勘,因为已有许多目录摆在我们的面前。我喜欢运用贯通的文化史方法,利用它们作为辅助的史料,指出它在历史某一问题上关键性的意义,这是我的着眼点与人不同的地方。

我和《尚书》

147

刘起舒 | 我近几十年的精力都集中在《尚书》一书上,语其远,则是由于我早岁承祖父授读,进大学后受顾颉刚先生教导这两方面的深远影响;语其近,则是由于四十五岁时由上级调来协助顾颉刚先生完成他整理《尚书》的宏愿,就是秉承其整理《尚书》的意图与规划,担任考释译证《尚书》全书的任务。

我和蒙元史研究

167

方龄贵 | 治蒙元史,就得熟悉《元史》、《元典章》、《元朝秘史》等重要史料,特别是《元史》,同时视野要宽。蒙元史既是中国史的一部分,又是世界史的一部分。研究蒙元史就不能不懂中国通史和世界史,孤立地研究蒙元史是不可取的。还要注意就地取材,我对云南元碑的研究,就是一个例子。最后,论证要严谨,要尽量用第一手材料,不要用第二手乃至第三手的转手材料。不能凭单文孤证,只凭一条史料就下结论。

我和印度哲学研究

183

巫白慧 | 记得在印度留学时,老师按印度传统的教学法给我讲授印度哲学。毕业后,我照老师传授的方法作研究。现在,在社会主义的祖国,如何开展印度哲学研究?是否应采用具有社会主义科研特点的新方法?带着这个问题,我阅读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印度历史、文化、宗教、哲学等方面的论述。从这些论述里,我找到了答案,获得了一把研究印度哲学的金钥匙——马克思主义的科研方法。

我与魏晋南北朝史

199

韩国磐 | 魏晋南北朝虽是中国史上大动乱时代之一,但同时也是许多新事物酝酿萌发之时,大者如均田制、府兵制、科举制均萌芽或开始于这一时期;生产方面如新的炼钢法、新的耕作和施肥技术、造纸业的突飞猛进等,均出现于此时;大书法家王羲之的《兰亭序》、学术著作《齐民要术》和《水经注》等,亦皆成于此期中。这些新事物的出现,正显示着为新时期的到来做好准备。因为魏晋南北朝正处于秦汉大统一之后和隋唐再度大统一之前,承前启后,变秦汉而启隋唐,承担着历史大转变的枢纽作用,使我由衷地迷恋这段历史,与之结下了不解之缘。

我和中国版本学

205

冀叔英 | 鉴别一书的版本,不应只分析辨别其刻版或抄写的年代,还应进一步熟悉该书传世有多少版本,现在某本稀见,某本流传尚多,某本由某本出,各个本子的异同优劣,辨其版刻源流。版本学的内容包括面是很广的,几乎每一种书都有其版本问题。

我与中国新石器研究

213

佟柱臣 | 中国新石器时代文化,是世界上最早的新石器时代文化。中国新石器时代早期的江西万年仙人洞,距今一万一二千年,而西亚、日本的新石器时代文化,约当公元前八千年,越南新石器时代文化,约当公元前七千年,中亚新石器时代文化,约当公元前六千年。因此说中国新石器时代文化,是当时世界上最早的新石器文化,也是最进步的文化。

我和宋史

229

徐 规 | 学习和研究中国史必须练好三个方面的基本功。清代姚鼐说：“余尝论学问之事有三端焉，曰义理也，考证也，文章也。”这三者是与史学家密不可分的必要修养，古今众多学者对此的看法是一致的。我在多年治史的过程中，深感这一说法确为颠扑不破的真理、行之有效的指针。

我和中国古代文学史

241

郭预衡 | 古人读书，主张“知人论世”，在文学史上，要想了解一代文学和作家，也必须了解作家所处的社会环境。因此我想，在一部分文学史中，怎样写好社会环境这部分，是个很重要的问题。这部分绝不是可有可无的一章一节，而是全部文学史的重要一环，它是与作家分论有机联系的章节，绝不是可以截取“通史”的一些片断便可充数的。这一部分写得好的标志，我以为至少要看它是否对于了解这一时代的文学提供了必要的条件，看它是否概括了这一时代的社会特征。

我与考证学

265

祁龙威 | 我把“占有史料”看作是史料工作的全过程，其方法统属考证。它包括搜集史料、比较史料和归纳史料。考证重在证据，只有证据确凿，才能成为定论。考证学切忌凭传闻、凭记忆、凭印象。

我和中国佛教考古学

277

宿 白 | 佛教遗迹以建筑构造的不同，可分寺院遗迹和石窟寺遗迹；以地区和派系分，主要是汉地佛教遗迹和藏传佛教遗迹。“文化大革命”前我着重的是汉地的寺院遗迹；“文化大革命”后，逐渐扩展重点范围，既包括了石窟寺，又包括了藏传佛教遗迹，因而产生了应当考虑较全面、较有系统的中国佛教考古学的想法。

我和中国文学史

285

吴小如 | 讲中国文学史不能忽视文字声韵训诂方面的基本知识，如果缺少这方面的知识，至少对古代文学作品不能做到正确而深透的理解；中国文学史的教学与科研不能像“铁路警察”那样“各管一段”，作为教师或科研工作者，不宜局限于自己所侧重的那一小块学术领域，而应胸有全局；同样，也不能“包产到户”，只管自己所研究的这一“块”而忽视另外几“块”的内容。这就是我在教学实践和学术研究中一直恪守的准则。

我和音韵学研究

293

邵荣芬 | 做研究工作首先碰到的就是选题问题。我认为在一般情况下，应该选择所攻学科的根题，也就是关键性的、有生长能力的课题。从汉语音韵学来说，《切韵》音系应该就是这样的根题。《切韵》音系是现存的一千多年前的一个完整的汉语音系材料，一般都根据它上推上古音，下连近现代音。故此对《切韵》音系认识得正确与否，就成了能否正确认识上古音和近现代音的关键。可见，对《切韵》音系的研究具有带动全局的作用，拿它作为首选之题，当是最佳选择。我就是这样做的。

我和宋史研究

307

漆 侠 | 研究中国古代史要处理好通史和断代史的关系,即通与专的关系。如果只搞通史而不搞断代史,那就必然把通史停留在一般化、表面化的水平上,根本不可能从各个时期历史发展的特殊面貌中描述波澜起伏、变化不已的古代史发展的总过程以及总规律。反之,如果只搞断代史而不同通史密切结合起来,人为地割断与通史的联系,不但无法说明这一断代史是怎样从前代发展而来的,而且也不能把这一断代史妥贴地放在历史发展的巨流中,从而说明这一断代史的历史地位。要想处理好通史与断代史这两者之间的关系,就必须是也只能是在专的基础上通,在通的基础上专。这是学习和研究包括宋史在内的所有断代史的一个前提条件。

我和古典目录学

319

来新夏 | 我真正入门于目录学的研究领域是在 20 世纪 50 年代中期。我在教学与科研工作中常常见到人们为了论史证史而需从浩繁的史籍中搜集资料,往往都是人自为政,穷年累月,孜孜不倦地去翻检爬梳,我就想为什么不可以把大量史籍分门别类地查清底数,编纂目录备用,免去人人从头做起之劳呢?于是,我即着手以已有的目录学知识编撰一部有清以来的人物年谱目录,即后来出版的《近三百年人物年谱知见录》。

我和中西交通史

333

龚方震 | 中西交通史的领域很广,注意到中亚一段的学者还不多,也许语言学是个难关,除了英语、日语外,还须通晓俄语、德语、法语,这些还只是基本要求。古代中亚的语言复杂,有古叙利亚语、突厥语、伊朗语、粟特语、吐火罗语、大夏语等,如不略具这些方面的基础知识,只能根据他人的二、三手资料稍事演绎,其艰难程度可想而知。

我和小说戏曲

343

徐朔方 | 中国的古代小说戏曲和西方不同,有它独特的成长发展历史。它的特点之一是小说和戏曲同生共长,彼此依托,关系密切,因为相当多的作品都在书会才人、说唱艺人和民间无名作家之间世代流传之后才最终写成,它们是不同的世代的作者在承续不断的流传过程中形成的一种集体创作。这是我对世代累积型集体创作的宏观理解。

我与《红楼梦》

357

冯其庸 | 我最初接触《红楼梦》是 1943 年我读无锡工专高中一年级时。1948 年我转到上海无锡国专分校,在课堂上正式听讲《红楼梦》。1954 年我到北京后,正碰上批判胡适、俞平伯先生的运动,我才开始认真读《红楼梦》。“文革”中,我的《红楼梦》被人抄家时抄走,我生怕这一阵风刮向全国,会把这部巨著毁了,于是每天夜深人静之后,用毛笔据影印庚辰本《石头记》,依原著行款朱墨两色抄写,整整抄了一年,这是我真正深入《红楼梦》的过程。

我与拓跋历史研究

389

田余庆 | 我抓住“子贵母死”制度问题来研究,只是想找到这一奇特制度的来龙去脉,这肯定会对拓跋历史的认识有所帮助。道武帝如果靠后族支撑自己的部落联盟领袖地位,是可以办到的;但是要靠它树立一种超越一切之上的专制君权,却是办不到。他必须有一个集中权力的过程,其中包括剥夺母后和母族权力,特别是母族干预拓跋事务的权力。我觉得探索子贵母死制度的实质和渊源,钥匙就在这里。

我与唐传奇研究

405

卞孝萱 | “五四”以来,对唐传奇的研究主要是:考证作者生平、写作年代;进行分类;探讨思想性与艺术性;进行注释、辑佚、赏析等。我另辟蹊径,以小说写作的政治背景为出发点,从传奇作者的政治态度入手,专与通结合,文与史互证,旁推曲证,以意逆志,透过表面的藻绘,进入作者的心胸,探索作者的创作意图亦即作品的真正寓意。

我与北京历史民俗

421

邓云乡 | 我不是北京人,也不是北京出生的外省人,虽然老辈几代都在北京生活过,可是我童年一直在乡间山镇。我时常想,也许我如果出生在北京,从小在北京长大,或许对北京没有那种较新鲜深刻的认识与爱好,也不会对北京历史风俗那样感兴趣,去注意观察、欣赏、理解它……

王钟翰

1913—

中央民族大学历史系教授



行己有恥
博學於文

右錄顧亭林語以自勵

戊寅三月王鍾翰書

我和《清史稿》与《清史列传》

王钟翰

最近北京中华书局张世林同志组织编纂出版《学林春秋》一书，专门邀请全国范围内年长一辈的从事哲学文史社会科学研究工作者各写一篇有关自己所从事的专业文章，汇集成编，嘉惠士林，意至善也。溷陋如翰，谬承不弃，亦以“我和清史研究”为题征文于我，我何敢滥竽充数，忝列于德高望重的名家之林以貽笑大方？乃累辞不获，而兹题太大，请以70年代十年期间内奉召来书局参加整理校点《清史稿》与《清史列传》两书为限，即改题为“我和《清史稿》与《清史列传》”，余则牵涉及之，拉杂缀成一小文，明知续貂之作，敢以附诸骥尾之末云尔。

一

记得1971年9月1日我被借调中华书局参加整理标点“二十四史”以外增加的《清史稿》一书的工作。同一天到书局报到的尚有启功同志，我们二人因事迟来了两个月。早两个月先到我们《清史稿》组的有罗尔纲（已故）、刘大年、孙毓棠（已故）三位同志，加上书局里的吴树平、何英芳二同志，我们组共有七人，与其他各史分组，全体共有十八九人相比，我们这组的人数就不算少了。顾颉刚先生（已故）受任为标点“二十四史”总编，可以不来书局上班，平日学习与具体事务，均由副总编白寿彝先生负责执行。一次，顾先生高兴来到书局看望各位同志，因为我是新来的，书局赵守俨同志（已故）赶快向顾先

生要介绍我,顾先生抢着说:“不用介绍,我们是老伙计了!”30年代中,我在燕京大学三年级,听过顾先生开的春秋史和战国史两门课。众所周知,二三十年代时,我国学术界有一种风气,凡有大名望、高地位的著名教授被称为老板,如胡适(已故)被称为胡老板,顾先生被称为顾老板。老师既被称之为老板,学生自然就是伙计了。幸运的是我跟顾先生相别三四十年之后,一旦相遇,他还清醒地记得我这个小伙计!更引为高兴的是,顾先生的身体健康,精神旺盛,记忆力甚好,这是我们学术界的一个莫大福分。

我们组有一次开会,罗老(尔纲,当时年逾古稀)也来参加小组会,讨论到如何对待标点的态度时,罗老非常认真诚挚地表态,说:“我们保证这本书《清史稿》出版不出一个错,哪怕是一个标点符号的错也不能有!”罗老出自内心深处的豪言壮语,一时引起大家的同感。我当时不知出于什么原因,插了一句:“我非常同意罗老的意见,但可否前面加上力争二字,免得出版后被人指出有错,不好交代。”谁知七八年后《清史稿》一书出版问世,被人揭露的错标或失误之处虽不算太多,但为数亦不在少,其责任首先在我,因为最后看校样,主要是我一人尚留在书局之中,而其他几位借调来的同志早已回校或回所了,我怎能推掉责任呢?那么,回忆七八年前我说加上“力争”二字,岂不正好是怕为后来出的错误开脱责任、打掩护嘛!

头一年,我和启功同志同在一间办公室,两张办公桌对面而坐,一般说,上班时各自理首看书、查书、标点,很少聊天。记得有一次在标点中发现一个难题不好解决,启兄感慨地说:“我们虽然从事清史研究有年,在某些方面也许多少有点一知半解,但就整个清朝一代三百年间全面来说,叫我们来干这项工作是顶不合适的,因为我们实在也干不好。”启兄此话,说到点子上。比如启兄当时正在标点《礼志》,他说:“五礼吉、嘉、军、宾、凶中我也许知道其中某一小部分,我哪能什么都知道呢?”其他可以类推。启兄所说,实是通人之论,我深有同感。然一部“二十四史”中除《宋史》交由上海方面负责外,余均在北京进行,前面已经提及,《清史稿》人数是比较多的,也只能是这样明知其难,而硬着头皮往前干下去吧。

举一例说,标点不那么简单的,在《清史稿·暹罗列传》中云康熙四年(1665)十一月暹罗国王遣陪臣等资金叶表文来朝,表文中有“暹罗国王臣森列拍腊照古龙拍腊马噶陆坤司由提呀菩埃”(十二年四月又再见一次),跟着

下文还有“正贡使握坤司吝喇耶迈低礼、副贡使握坤心勿吉瓦替、三贡使握坤司敕博瓦梯、大通事揭帝典”。按上列所举的暹罗国大臣、正、副、三贡使、大通事之名，显系暹罗文的汉字音译，三字为姓名固然较为常见，长达七字、九字的姓名就不多见了，而长达十九字之姓名，实属罕见。我们都不解暹罗文汉字音译之含义，我就特地去了一趟北京大学东语系（今改名东方学系）请教，答以三百多年前所有汉字译音的暹罗字，很不好还原为暹罗语了。事实正是如此，我们不能强不知以为知，不但三个字、七个字、九个字的名字不好强为区别开来标点，就连以十九字为姓名的暹罗大臣也只好连标成为一个名字，这实在是我们迄今为止没法解决的一个难题。

《清史稿》是民国初年开馆延聘前清遗老遗少，按照历代封建王朝“正史”的体例编纂，至1927年大致完稿的一部中国末代王朝的“正史”。此书首先刊印于1928年，共印一千一百部，其中四百部运往东北发行，被称为“关外本”即“关外一次本”；史馆人员将存留于北京方面的七百部又作了一些抽换修改，这些书通称“关内本”，遭禁，并未公开发行；以后东北又小有改动，重印过一次，称为“关外二次本”。

我们参加标点《清史稿》的工作，首先做的第一步是要选定工作本。凑巧的是书局只有“关外二次本”，已被用为工作本了，而书局方面仍表示，工作本还可以重新考虑。经过一番审核，按版本而论，“关内本”似是正本，但实际上“关外一次本”才是原刻本，而“关外二次本”经过小修改，不但比“关外一次本”好，与“关内本”相比，也是较好的本子，可以说算是定本。我们所用的工作本既是“关外二次本”，但同时对本三篇目内容不同的地方，都加有附注，录出异文，附于有关卷页之后，有此一部新标点的《清史稿》，而三种不同版本的异同均已囊括在内，是不啻有此一书而兼有三书了。

工作本问题解决了，我们所做的工作，主要以标点、分段为重点。关于《清史稿》中史实错误及同音异译的人名、地名、官名、部落名称等一般不改动，只在本篇或同一个传内略作统一。清朝避讳字，尽量改回。但如王士禛因避皇太子胤禔嫌名，改名王士正，乾隆三十九年（1774）以改士正不当，乃命改名为王士禛，见《清史稿》卷二六六，迄未改回原名。对于历史上少数民族名称，凡带有侮辱性的字样，除旧史习见的泛称如苗、藏、蒙、满等名称以外，余如“獯”改作“壮”、“猺”改作“瑶”、“猓”改作“回回”或者“回族”等，均已加

以改正。史文的脱、误、衍、倒和异体、古体字等，也作了校改。亦有未改者，如《袁希祖传》有云：“改铸大钱，未几，当百、当五皆不行。”“五”下脱“十”，应为“五十”；又如同传中有云：“疏言：团者一时司集……即云团练。”其中“者”为“则”、“即”为“既”之误字，《清史列传·袁希祖传》可证也。还有由于行、段的错简，以致事实与情理不合处，已发现的也经过查对校正。但原文文理不通，或人名、地名等脱误而又查不到出处的地方，都维持原状，不妄加改动。

全书总目原分五卷，现予合并，不再分卷，并在原来基础上略作增补，以便检阅。

这里还需要指出的一点是，《清史稿》既经过整理点校，重新出版，其中史文的脱、误、衍、倒和异体、古体字等，均作了校改。乾嘉学派校勘学非常重视每改一字必须注明出处。今全书不作校勘记是很不负责任的。当时启功兄和我曾向书局领导提出过这一问题，回答是从未向上层提及《清史稿》要作校勘记，多一事不如少一事，还是以不出校勘记为妥。迄今言念及此，《清史稿》之缺校勘记，不能不说是一件引为遗憾之事了。

《清史稿》终于1975年初全书点校完毕，就在这一年由书局将全书交付新华二厂付排。从第二年开始看清样之际，罗尔纲、孙毓棠、启功诸同志先后被抽调回原单位了，刘大年同志早于1972年春被郭老（沫若）调回负责编写《中国史纲要》近代史部分去了。唯有我一人的原单位中央民族学院没有调我回去，因此，看《清史稿》清样的责任落到我和吴树平、何英芳三人的头上。当时上面催得很紧，一部七八百万字的《清史稿》限定在一年出齐。清样不来则已，一来好几百页甚至好几千页，必须在几天内看完交出去。平均每天看百十页是最少的，多到三四百页，一般二百来页。整整看清样看了一年多。记得1976年7月28日唐山大地震后的第二天，我还从北大中关村私寓送看过的清样稿到王府井中华书局交稿，一到书局大楼下面，门卫说：“刚地震完，不能上楼，安全第一，回去吧！”不管怎样，全书五百二十八卷，分装成四十八册，于1977年全部出齐了。

二

1977年12月《清史稿》全书出齐之前的几个月，我看清样的任务即将完成，当时，中央民族学院研究部领导见我面时虽也口头上几次催我回去，但院